



同文馆

Seeking

Harmony rather

than Uniformity

Roger T. Ames



和而不同 中西哲学的会通

海外中国哲学丛书

[美]安乐哲著 温海明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海外中国哲学丛书

和而不同 中西哲学的会通

[美]安乐哲著 温海明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和而不同：中西哲学的会通/(美)安乐哲著；温海明等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1
(海外中国哲学丛书)
ISBN 978-7-301-15298-0

I. 和… II. ①安…②温… III. 哲学—研究—中国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91370 号

书 名：和而不同：中西哲学的会通

著作责任者：[美]安乐哲 著 温海明等 译

责任编辑：王立刚 吴 敏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5298-0/B·0802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phil@163.com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26.75 印张 321 千字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总序

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这套丛书精选了赫然于汉学家案头的那些奠基之作。这些著作是西方学宿公认的经典，在西方学界理解中国思想的进程中，这些经典奠定了范式和框架。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推开一扇窗户，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藉此领略海外中国哲学和文化研究的图景。

二十年前，在研究中国思想的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之间还横亘着一条鸿沟。西方学者在撰写著作之前，需要阅读中国杰出学者和西方同行的作品，然后才能自己落笔著述。但在中国人看来，西方人对中国思想的研究顶多是边角的余兴。中国是孤悬于西方学者研究边缘的对象，中国学者也并不重视西方人研习中国文化的著作，于是，两个学术群体之间几乎没有对话。

今天大量汉学家们的作品被翻译出版，充盈着中国的书店卖场；学者们则在中西学府之间往来切磋，络绎不绝。顶尖的中国学者臻缮了他们的外语技能，在他们的著作中对西方同道们的研究兴趣也与日俱增。西方学者也终于能用中文和中国同行一起参加中国的会议和研讨。西方学者认识到中国的哲学和文化仍然鲜活，生活在其中的中国人就是最好的体现。

中西交流之间这个奇妙、重大而健康的转变，其缘由可谓多矣。

其一，二十年间中国已经握紧了国际政治和经济巨大餐布的一角。这个古老的国家需要一个自我理解的平台，这是她构筑新国际关系的基础。自我理解需要内部和外部两个视点。对此中国人早有慧见：“不识庐山真面目”所言即是。当把中国的哲学和文化置于国际化、语境化的世界文明脉络中时，中国文化就会获得新的定位。

其二，对西方人而言，中国的持续开放使他们有机会直接就教于中国学者，并分享其研究之硕果。曾经遥远神秘的中国如今已经成为世界学术群体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进入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世界陷入了经济和政治的泥淖，文化的处境也差相仿佛。政治和经济上的超级大国已经穷途末路，旧的国际秩序亦岌岌可危。不过这个“危机”既是危险也是机遇。我们可以期待政治上的寡头霸权将要被万国协商式的全球社群所取代，经济上寡富众贫的不公要重新调配，以期天下同此凉热，仁爱泽及四海。

不过，如果我们不能在个体、群体、国家的层次上，涤除主导世界文化的个人主义之荒谬，不能认识到人类经验的有机性、生态性，不能领会人类大家庭里彼此在各个层面上的唇齿相依，上述政治经济的改善就不可能发生。

其三，众所周知，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孽因，两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化沉暗无闻。今天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被广泛承认，而中国文化对外国人来说仍然神秘。我们也知道，在不远的将来，日益强大的中国将更有力量改变世界秩序，这将使中国文化成为那个美丽新世界（很有可能比现在的好）中举足轻重的因素。中国将成为文化交响的重要旋律，世界将再次听到中国文化的声音。

既然中国文化将为这个新秩序贡献良多，我们就需要尽可能透彻地了解她。我希望这套丛书翻译的著作能使此前已结硕果的研究增添一个层面：面对当代西方对中国传统进行的丰富阐释（有时也是误释），我们去追溯西方的中国思想研究历程中泽被最为深远的学术经典。

安乐哲

新版序言

在本书的第一版（2002年）的序言里，我回忆了使我能够在北京大学校园中未名湖畔徜徉的个人经历。光阴似箭，数年以后的今天，我继续着我对儒家思想的兴趣，并将这些年来写就的一些新论文放到这个修订版中来。我的个人故事同样也在继续着。现在，我已经当了40多年中国哲学的学生，这生发出了一个问题——对儒家传统的研究对我的个人生活有何影响呢？实际上，中国人可能会问，像我这样的外国人，如何会成为儒家中的一员？

虽然我们自己会给拒绝这种可能性找出各种理由，但是也许孔子会用肯定来回答这个问题。在孔子的时代，一个“外国人”可能是楚人或者晋人，“远方”会是孔子意义上的“外国”。正如孔子所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再想一下韩国、日本和越南吧，它们都是儒家思想能够以一种深厚而持久的方式转化异民族文化的活例。

孔子告诉他的弟子，他“欲居九夷”，学生问：“陋，如之何”，孔子回答：“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实际上，当上了年纪的孔子对鲁国越发失望的时候，他选择的是带领他最有前途的学生们周游列国十数载，看看是否能在异邦，与“外国人”一起实现文化转化之大业——在鲁国，实现这一文化目标的可能性已经渺茫。

不过总而言之，对我来说成为儒家中的一员意味着什么呢？唯一合宜的回答是，在日常生活中努力成为儒家。除此之外，别无答案。成为儒家并不在于你是什么，而在于你去做什么。当代儒家的复兴源自于孔子旨在处理人类最基本而永久的考量：家庭角色和关系的培养，通过教与学的个人成长，对真正友谊的追求，通过管理我们的所言所为来涵养性情，人类繁荣的获致与维持，等等。孔子相信，提升人类经验的最佳方式始自家庭：下学而上达。对社群、国家乃至最终对宇宙的感受的培养以及扩展，始自家庭中的感受。

然而，什么是儒家思想也许是个错误的问题。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对儒家思想的分析性理解。儒家思想并不把自己灌进意识形态的酒瓶中，这种意识形态由抽象箴言、决定性的可普遍化原则，以及能够完全运用到人类经验中去的一般性理论来定义。儒家思想是关于一代又一代的特定的人如何践行他们角色与关系的一种叙事。它始自孙辈在表达对祖辈的感情（孝）时，以及幼弟在表达对兄长的尊敬时的那份愉悦。虽然儒家的这一安置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内涵，它的持久性力量在于它生发自一种对实际人类经验的相对直接的解读。儒家并没有依赖形而上的假设或者超自然的思辨，而是通过将生活中的寻常事物附魅从而聚焦于我们触手可及的个人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儒家是正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自然主义。祖母对孙子的爱既是最寻常的事情，也是最不同寻常的事情。

通过发展对日常人类经验中最基本和最持久的层面的洞察力——孝、忠、友、耻感的培育、教育和社群等等，孔子保证了它们之间的持续关联性。能在孔子自己的话语中找到，并且使得孔子的学说在中华传统中传承不已的正是它的渗透性与适应性，这也是儒家思想的特征之一。孔子的贡献仅仅在于继承了当时的文化遗产，将过

去的智慧适应他当时的历史时刻，然后建议后来人仿效他的做法。^①

孔子在《论语》中的个人形象并不意味着设定了一个普遍化的模型，每个人都要按照这个模型来生活。相反，《论语》中展示的是一位特别者的一生：他如何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涵养人性，他的一生成就斐然，赢得了周围人的景仰。我们可以稍微自由地玩味一下“论语”这个书名：将“论语”（discoursing）更具体地解读为“基于角色进行论语”（role-based discoursing）。

实际上，在阅读《论语》的时候，我们与尽全力做好自己诸种角色的孔子了：这是一个充满关怀心的家族成员，一位严师，一位一丝不苟又一身正气的学者官员，一位有爱心的邻居兼社会成员，一位批判性十足的政治顾问，一位对先人充满感激之情的后人，一位对文化遗产极为热心的继承者，同时也是“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中的一员。他提供给我们的历史形象而非原则，是劝勉而非律令。我将会尽力展示，孔子的洞察力的力量和持久价值在于，所有这些观念都是具有直觉性质的说服力，可以比较容易地适应每一代——包括我们这一代——的具体情况。中国的自然宇宙论是儒家思想的背景，它使儒家比经验主义更为经验主义——即它使儒家思想成为一种激进的经验主义；它尊重个别的独一无二性，也尊重对一种普遍智慧的需要，这种智慧在展望丰饶未来的时候，将这种个别性也考虑进去。儒家思想并不提出普遍性原则，并假设基于一些严格区分性概念的自然种属的分类学，相反，儒家对具体的成功的歷史实例——比如《论语》中叙述的孔子自己的具体生活事件——进行局部普遍化。

^① 《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逐渐地，儒家讲述了特定而多样的一群人的故事，通过精炼这些人类最根本的感受，这群人在这么多世纪里发展出了一种分享的、慢慢浮现的、兼收并蓄的文化集合。实际上，兼收并蓄的“和而不同”，以及对“同而不和”的摒弃，才使得儒家思想成为我们自己的历史时刻中全球文化的一种丰富可能性。

儒家思想中也具有一层意义深厚然而自成一格的宗教维度。在儒家宗教性和亚伯拉罕传统的宗教性——它基本上定义了欧洲文化叙事中的宗教的意义——之间有几处深刻的区别。我认为，与敬畏在时间上居先、独立而外在主体的绝对意义的“崇拜”模型——施莱尔马赫称之为“绝对依赖感”(absolute dependence)——不同，儒家宗教体验自身是繁荣的社群的产物，宗教生活品质在此是社群生活品质的一种直接结果。

儒家思想中的神圣性并不是繁荣社群建立之初的那些根基，而是社群的内在品质，是它的绽开状态。它是一种人类中心而非上帝中心的宗教性，来自于对礼仪的庄重敬意。

儒家宗教性与亚伯拉罕传统的第二个不同之处，在于儒家的宗教性既不是救赎的也不是末世主义的。虽然它包含了某种转化论，但专门是指人类在日常生活中生命品质的转化，不仅提升和激励我们的日常生活，而且进一步辐射性地将世界赋魅。当人类饮食提升到高级烹饪术(haute cuisine)，当拿木棒做标记被训练成精美书法和令人叹为观止的青铜图案，当粗糙姿势被美化为仪式的肃穆行进和舞蹈的翩翩风姿，当单调的声音丰富为庄严难忘的旋律，当随意交合的热烈成为家庭长久而可靠的温暖的时候，宇宙的广度和深度都得以扩展了。正是这种转化——变得优雅的日常生活——拥有某种超越性的超自感染力，似乎至少部分地为神秘性提供了另外一种宗教表达。

排外的别种文化拒绝接纳儒学的态度，源于一种文化不情愿从根据另一种文化的价值观来规范和再定义自身。但是“Confucianism”是对兼容并包的“儒学”一词的西方翻译。儒学是有修养人们的优雅生活——经由个人成长和实践智慧的转化性力量来实现。知识分子团体用他们的文化能力为未来的子孙做出表率——提升日常生活和人们的活动，并给人们带来欢愉的哲学模型表率，这个故事还在持续下去。有谁不想发宏愿成为被人类生命所激励的生命中的一员呢？

目 录

总序/1

新版前言/1

第一版前言/1

第一编 论儒家问题/9

“境生”儒家之“和”

——中国早期宇宙论中的“协重”(collaterality)思想 /11

儒家思想与实用主义/39

儒家民主主义/57

儒家学说与社会进步/72

行于五常：人之为人，抑或人之成人？/79

唐君毅和儒家民主观/99

通假：一条儒家的意义生成之路/128

第二编 论中国宗教/143

中国式的超越和西方文化超越的神学论/145

礼与古典儒家的无神论宗教思想/168

第三编 论中国思维的模式/193

理性、关联性与过程语言/195

汉哲学关联思维模式/223

中国的性别歧视观/255

孙膑兵法概论/286

第四编 论中西对话/321

差异比较与沟通理解

——当代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哲学的倾向及障碍/323

中国哲学的翻译问题/334

儒学与杜威的实用主义：一种对话/351

把文本变成自己的：原原本本地阅读中国哲学之反思/389

参考书目/407

第一版前言

清晨我推开面朝未名湖的窗户，看到师生们络绎往回，在谈笑声中享受着暮春佳时。在这本小书付梓之际，可以抽空回首自己走过的道路，不禁感叹历经何等辗转，我才得以坐在这湖畔的窗前。

我研习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生涯可以追溯到少年时代。我的父亲是一个侦探小说家，哥哥教英语文学，写作一直是我们家庭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少不更事的我激情满怀地投身于诗歌创作，并且为了实现与杰出同辈风云际会的梦想，只身离开温哥华温馨的家，前往南加州以人文教育著名的雷德兰斯大学学习。在那里我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而且让我心怀感激的是我能够以交换学生的身份被送到香港进修。那是1966年夏季的一个傍晚，18岁的我孤身来到那个充斥着光怪陆离的标志、色彩和味道的世界。今天，我依然清晰记得在中国的第一个夜晚，当我从不起眼的内森路旅馆向窗外眺望时，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开始了一个无法逆转的转折。

我在雷德兰斯大学时学习西方哲学，同时满腔热情地投身诗歌创作，追求紧张刺激和惊心动魄的生命体验。像多少世纪以来的众多年轻人一样，我很快被苏格拉底的真诚感染，开始了回应他“认识你自己”的哲学征程。与苏格拉底发现自我的呼唤正好相反，我在香港时开始接触儒家哲学并迅速沉醉于中国哲学以“修身”、“弘道”和最终“平天下”为主旨的思想艺术。在新亚书院的那个夏

季，我有幸聆听了一些著名哲学家——尤其是唐君毅先生和牟宗三先生的教诲。当时中国刚刚走出饱经西方帝国主义蹂躏的漫漫长夜，唐先生和牟先生正致力于弘扬中国传统的忍耐精神。那年夏末，我转学至沙田的崇基书院，开始师从劳思光先生钻研《孟子》。劳先生献身哲学的热情征服了包括我在内的众多年轻心灵。

那时的香港还非常贫穷。对于我们学生来说，杂有沙子的米饭和清可见底的菜汤简直是家常便饭。但是，年轻教授们的课程却令人振奋，班上许多同学后来都成了我的好朋友，而且这种友谊持续了几十年。不久以后，香港发生了排外暴动，有好几次，我和几个同学由于吓得不敢上街，彻夜滞留在别人家里，但主人对我非常关照。如果说我从课堂上和书本中学到了一点中国哲学，那么我从与我生活迥异的人们身上学到的要多得多。他们彼此关爱的人情关系让我见证了中国传统智慧的生命力。

接下来的那个夏季，已是一个相对成熟的“年轻”人的我怀揣着刘殿爵先生翻译的《道德经》，从香港码头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客轮回到了加拿大。那时我已倾心钻研中国哲学了。

从在雷德兰斯时算起，我总共花了十三年才完成博士学位。为什么？因为那时整个西方世界找不到教授中国哲学的地方，即使现在，西方大多数哲学系也根本不教中国哲学。作为专业学科的西方哲学至今仍旧坚持哲学不过是盎格鲁—欧洲大陆哲学而已，而这无非是想沿用地缘标准而非哲学尺度来说服自我及世界。这一尺度的潜台词是盎格鲁—欧洲系统以外的其他文化对追寻智慧没有兴趣。在香港学习和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这种观点是心胸狭隘和不足为道的。在此后的学术生涯中，我越来越致力于挑战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中种族中心主义的顽固偏见。

为了能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中国哲学，我不得不完成汉语和哲学两个本科学位。读研究生时情形也类似。我先用两年时间完

成了台湾大学哲学系的学业，并同时师从方东美先生问学。1972年我从台湾回到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在亚洲研究系而非哲学系完成了研究生学业。

我在台大学习期间逐渐意识到世界哲学界令人心惊的状况。今天在高等教育领域仍旧是西方哲学或者说几乎就是欧洲哲学一统天下。无论在台北、东京、汉城、北京、德里，还是在波士顿、牛津、法兰克福或巴黎，这似乎都被视为当然。土生土长的亚洲哲学和美国哲学不但在国外为人忽视，即便在本国文化中也被严重边缘化了。威廉·詹姆士在吉福德讲座的开场白中坦言：“对我们美国人来说，聆听欧洲人的训导似乎已习以为常。”他的话大致没错，只是他并没有将亚洲人也算在欧洲哲学的当然听众之内。自1907年至今，这种情形在近一个世纪里鲜有改变。

此后我又在日本的亚洲研究系学了两年中国哲学，而后转到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那里我得以与哲学家一起研习中国哲学。也正是在伦敦大学，我得以有机会师从西方最受尊崇的中国哲学翻译大师刘殿爵先生。刘先生坚持主张阅读原始文献，这对我思考如何研究中国哲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刘先生始终对脱离哲学原始文献的浮泛的学术讨论心存反感。第一天上他课时，他就劈头问我：“《淮南子》你读过几遍？”当得知我未及要求时，他面带愠色地问道：“仅此而已吗？”在他的谆谆教导下，我终于获得了博士学位。但多年以后我们仍在暑期的几个月里一起蹲在他汗牛充栋的书房中钻研《淮南子》。从刘教授的言传身教中，我明白了怎样才不愧身为人师。

葛瑞汉也使我受益匪浅，不论是我再伦敦大学期间，还是其后他受邀至夏威夷大学做访问教授时，我都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那些年他沿着葛兰言的思路，潜心研究如何将“关联思维”作为中国哲学特质，这对我产生了特别的启发。

完成了伦敦大学的博士学业后，在刘殿爵先生的推荐下，我十分幸运地得到了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的教职。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是西方惟一授予中国哲学、日本哲学、印度哲学、佛教哲学以及伊斯兰教哲学博士学位的哲学系。

夏威夷大学哲学系在西方哲学界独树一帜，该系的第一位系主任是陈荣捷先生。20世纪30年代，他跟查尔斯·穆尔一道创建了这个综合性的哲学系。设立这个综合性哲学系的基本想法是，具备西方哲学背景的学生学习非西方哲学比单纯学习非西方哲学的学生更有优势，因为受过西方哲学训练的学生能够运用不同的分析方法、手段和全新的视角来理解和拓展中国哲学传统。这种训练的优势并不在于西方哲学有着中国传统所缺乏的而研究哲学所“必需”或“重要”的“严谨性”，而在于它能够提供一个更有利的观察点，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唐君毅、牟宗三和方东美三位先生对此都深有感触。

虽然虚心学习对双方都有益，但是大多数西方哲学家对此视而不见。西方哲学的研究可以通过对非西方传统中不同语言和不同范畴体系的众多相似问题的思考而得到很大提高。举例来说，以著名哲学家怀特海、威廉·詹姆士和约翰·杜威所倡导的过程哲学思维方式在西方哲学中算得上较新的课题，但中国传统的“气”宇宙论早在《易经》中就包含了过程哲学的世界观。如果认真研究既已成熟的中国过程哲学思想，近代西方对过程哲学的兴趣可能会大幅提升。其实所谓“非此即彼”的传统存在着极大的“互补性”。东西方哲学应该尽快改变相互排斥的立场。

我到夏威夷大学后不久就开始了与郝大维的学术合作。我们前后共合著了六本学术专著。在持续二十多年的友好合作中，我们力图将汉学技巧和哲学方法融会贯通，并将其运用于对传统中国哲学的诠释性研究及哲学经典的新译中，当然这一努力还未臻于完美。